殖民地朝鲜的兵站基地化

王 进

(北华大学, 吉林省吉林市, 132013; 1501474120@qq.com)

摘要: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 日本殖民当局在殖民地朝鲜进行战时动员, 实施了涵盖多方面措施的兵站基地化政策。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增强军警力量、推行皇民化运动、畸形激进的工业化以及疯狂掠夺人力等手段, 强化对朝鲜的全面控制与剥削。该政策造成朝鲜的经济受损、人民饱受戕害以及民族情感受创, 虽留下一定工业基础但弊端显著, 其衍生的遗留问题多次引发日韩外交争端, 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大阻碍。

关键词: 日本侵略战争; 殖民地朝鲜; 兵站基地化; 日韩关系

引言

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 为了充分挖掘战争潜力, 日本加强了殖民地朝鲜的剥削和奴役, 旨在将朝鲜半岛打造为日本维系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和兵站。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日本殖民当局实施了战时兵站基地化政策, 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其遗留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成为朝鲜民族的重大精神创伤, 并对战后日韩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日韩关系, 也对如何面对和处理中日间的历史认识分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日本殖民统治朝鲜的历史背景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崛起后便图谋染指朝鲜并将其作为实施大陆政策的战略前沿基地和跳板, 早在1876年日本便以江华岛事件为开端逼迫朝鲜开港, 此后又利用一系列事件和不平等条约逐步侵夺朝鲜的主权[1]。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分别战胜了对其侵略朝鲜最具威胁的清朝和沙皇俄国后, 日本又通过条约承诺不损害美国和英国在朝鲜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后两者对其独占朝鲜的默许[2]。如此日本基本清除了其吞并朝鲜的主要障碍并于1910年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 朝鲜完全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10年-1919年三一运动前的“武断政治”期、1919年三一运动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文化政治”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45年日本投降的战时动员期[3]。

在“武断政治”期, 日本总督府实施高度集权的独裁统治, 剥夺了朝鲜人民的言论自由和集会等权利, 甚至连亲日的一进会也被解散。日本总督府还建立了严酷的宪兵警察制度, 其中宪兵是军事警察。宪兵警察对朝鲜人民滥施刑罚, 动辄以扰乱治安、破坏秩序等罪名逮捕朝鲜人且任意施加笞刑甚至死刑, 1912年被捕入狱的朝鲜人已超过五万人[4]。为了控制朝鲜的经济命脉, 总督府以土地调查的名义掠夺了大部分原属于朝鲜皇室的“公田”、所有农村共同体或同宗族的土地和部分朝鲜农民的土地, 将掠夺的土地转给日本会社或日本移民。日本殖民当局在打压朝鲜民族工业的同时着重发展朝鲜的采矿、交通运输、金融和邮政等, 巩固殖民统治的基础并使朝鲜经济依附于日本经济。而为了彻底将朝鲜人民奴化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 日本殖民当局还实行了文化教育层面的同化政策, 包括定日语为国语、禁止讲授朝鲜的历史和地理等[5]。

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爆发后, 国际社会对日本在朝鲜的残酷镇压予以谴责。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 日本总督府迫于压力不得不调整统治策略, 实行表面宽松的“文化政治”, 主要调整包括: 允许文官出任朝鲜总督; 实行普通警察制; 提高韩国人的受教育水平; 放松新闻出版管制。这些调整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一是直到朝鲜半岛获得解放都没有一个文官被任命为朝鲜总督; 二是警察机构和警察人数实际上在增加; 三是朝鲜人与日本人的差别教育如故; 四是出版物的审查制度依旧很严格[6]。

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殖民当局撕下了“文化政治”的伪装, 准备将朝鲜作为日本维持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和兵站, 朝鲜进入了战时动员期。七七事变后, 朝鲜总督南次郎宣称朝鲜已经转变为对华战争的

“大陆前进兵站基地”[7]。在战时动员期，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朝鲜的武力控制和人力掠夺，片面发展以军事需求为导向的重化工业，并进一步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将朝鲜的人力物力转化为日本战争机器的战力。

2. 兵站基地化的具体实施

2.1. 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的增强

九一八事变后，朝鲜驻劄军增加了一个师团，到太平洋战争末期共有约23万驻朝日军。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警察从2万名增加到3.5万名[8]。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的增强不仅强化了对朝鲜人民的管制和剥削，还为后续朝鲜兵站基地化的一系列措施提供了辅助和保障。

2.2. 推行恶毒的皇民化运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朝鲜被当作日本在大陆的后方基地，其战略地位愈加凸显。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朝鲜的日本殖民当局在“内鲜一体”的口号下实施了变本加厉的旨在抹除朝鲜民族特性的皇民化运动，其措施包括强制朝鲜人民参拜神社、将朝鲜语从学校的必修科目中删除、实行“创氏改名”即要求朝鲜人改用日本姓名、强迫朝鲜人吟诵对天皇效忠的“皇国臣民之誓词”等[9]。

为了落实皇民化政策，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思想专制统治。1936年12月日本殖民当局颁布了《朝鲜思想犯保护观察令》以监视《治安维持法》的违反者，尤其是朝鲜的民族解放活动家。1937年7月日本殖民当局设立了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1938年8月在总督府警务局指导下成立了朝鲜防共协会，还建立了“对应时局全鲜思想报国联盟”。1941年1月该联盟被改组为“大和塾”，强制“思想犯”加入并要求他们“改过自新”。1941年2月，在准备太平洋战争时日本殖民当局公布了《朝鲜思想犯预防拘禁令》。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各项旨在强化思想统制的法令纷纷出炉，如《朝鲜战时刑事特别令》极大地提高了对“变革国体罪”等“思想犯罪”的量刑。日本殖民当局还强迫朝鲜人民以十户为单位成立“爱国班”，“爱国班”定期举行“班常会”，强制成员进行举旭日旗、参拜神社等活动[10]。出版物的审查标准也更严苛，1939年，出版警察公布了详尽的禁止涉及的话题，尤其关注以下话题：诋毁天皇或皇室机构、军事事务、激进思想、日朝关系和朝鲜民族主义[11]。

皇民化运动妄图强行消解朝鲜民族的主体意识，严重践踏了朝鲜人民的民族尊严，导致反抗激烈。到战争结束时朝鲜的日语普及率也不高，朝鲜的抗日独立运动也始终未曾停止。

2.3. 畸形激进的工业化

由于朝鲜具有丰富矿产资源、充足水电供给和廉价劳动力，为了满足战时的军事需求，1931年到1942年期间的两个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和南次郎将朝鲜半岛的工业化视作日本大陆军事政策的一部分。宇垣一成以保护性关税、补贴等手段鼓励日本私人资本流入朝鲜半岛北部。南次郎也向私人投资者提供经济激励，包括低息贷款、扩大债券发行额度、降低税率、为土地征用提供便利等。在1938年9月的一次总督府会议上，朝鲜被正式指定为“军事供应基地”。总督府制定了快速发展军事相关产业的计划，包括金属（铝和镁）、煤炭、石油及其替代品、硫酸铵、炸药、机床、机动车、铁路车辆等[12]。

在朝鲜总督府的支持下，日本资本加大了对朝鲜的投资。大量工业设施被建立以生产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在战争后期，朝鲜成为了日本重要的工业原材料来源地，尤其是能源密集型的原材料[11]。从1930年代初到中期，朝鲜半岛北部建设了大型的工业综合体如三菱的钢铁厂，纺织和橡胶等轻工业也有所发展。该时期的工业化带来了朝鲜工业结构上的显著变化，轻重工业的比例从1930年的79.3%对20.7%转变为1943年的50.5%对49.5%[13]。

朝鲜的整体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制造业对朝鲜商品总产量的贡献比例从1931年的22.7%上升到1939年的39%，农产品的比例则从1931年的63.1%下降到1939年的42%。1939年，采矿业和制造业共同构成了朝鲜总产出最重要的部分，共计占到45%。采矿业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重采金转向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所需的铁、钨、石墨等矿产，这一点印证了朝鲜沦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制造业方面，其结构特点值得关注，表1列出了各部门产值在制造业中所占的百分比[6]。

表1 殖民地朝鲜制造业各部门的产值变化

种类	制造业各部门的产值(百分比)		
	1930年	1936年	1939年
纺织	12.8	12.7	13.0
金属	5.8	4.0	9.0
机械器具	1.3	1.0	4.0
陶瓷	3.2	2.7	3.0
化学	9.4	22.9	34.0
木制	2.7	2.7	1.0
印刷	3.1	1.8	1.0
食品	57.8	45.2	22.0
电力	2.4	5.6	2.0
其他	1.5	1.4	11.0
合计	100.0	100.0	100.0

表1显示出朝鲜的食品加工业占比下降明显，取而代之的是化学工业、金属制造和机械制造的崛起。这也凸显出日本殖民当局致力于发展重工业，将朝鲜打造成日本侵略战争的后方军事工业基地。

在发展速度上，该阶段朝鲜的工业化在日本殖民当局的主导下十分激进。1921年，工业生产只占朝鲜总经济产出的15%左右，而在战争期间，这一比例上升至将近40%，工厂数量在1936年至1943年间从约六千家公司增加到近一万五千家[12]。1930年代韩国的制造业生产及增加值的增长率平均每年超过10%。到1939年，采矿和制造业占了朝鲜商品总产量增长的近80%，化工产量以每年超过17%的速度增长，金属产量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11]。但如上文所述，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为了应付战争需求，这导致朝鲜的产业结构是不均衡的。工业的地域分布上也有巨大差异，绝大部分重工业都集中在朝鲜北部，如三菱矿业公司在清津的炼铁厂[14]。

随着战时工业的迅速扩张，朝鲜工人的数量也在增加。1931年，共有142,676名朝鲜人在各种工厂和矿山工作；到1943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731,751人。但朝鲜工人的工资不到日本同行的一半，且工作强度巨大，许多朝鲜工人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这一点从朝鲜的用电量也可窥见一斑，当时朝鲜的水电发电量大约是台湾的三倍，但只有不到12%的朝鲜家庭能用电灯，这一数据在台湾则为36.3%。此外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对朝鲜人的歧视，需要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工业和行政职位通常由日本人担任[15]。1930年代朝鲜的工业化本质是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军事需求的畸形工业化，并未考虑朝鲜人民的福祉。

2.4. 疯狂的人力掠夺

随着日本陷入侵略战争的泥潭，大量征兵导致了严重的劳动力缺口，日本政府将强征朝鲜劳动力提上了议程。193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日本政府和军方据此制定了适用于朝鲜的《国民动员计划》。1939年日本将大批朝鲜人强行征调到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库页岛、南洋群岛等地。这些朝鲜人在工矿企业、建筑工地等充当苦役，这些工作异常艰苦且危险，许多人因劳累过度、卷入战争等原因而死亡或失踪。根据朝鲜总督府的相关资料，1939年到1944年被强行征调到日本本土、库页岛和南洋群岛的朝鲜劳工超过65万，实际数据应更加夸张[16]。更令人发指的是，如果朝鲜劳工建设的是军事相关工程，完工后会被日本殖民当局以保密为由集体屠杀，平壤美林机场的800名朝鲜劳工和千岛群岛的5,000名朝鲜劳工都是以防止泄密的理由惨遭屠杀[10]。

1937年全面侵华后，日本本土兵源愈发短缺，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将朝鲜当成日本侵略战争的后备兵站，身体强壮的适龄朝鲜男性被逼充当日军的炮灰。1938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在朝鲜实行“陆军特殊志愿者制度”，同年在日本海军也实施了类似的制度。从1938年到1943年，有超过80万朝鲜人“自愿”加入日本军队[11]。随着战事的激化，1942年5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在朝鲜实行强制兵役，并通过演讲等方式进行征兵宣传。针对适龄朝鲜男性的军事训练中心被大量建立，1942年12月有741个训练中心，到1943年，训练中心的数量猛增至2,699个，学员人数达到75,376人。1944年12月，第一批四万五千名被征召的朝鲜人加入了日本陆军，另有一万人加入了日本海军[17]。

除了对于朝鲜男性实行强制苦役和兵役外，日本殖民当局还对朝鲜女性实行慰安妇制度，即强迫朝鲜女性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据估计，日本强征的慰安妇总数在七到二十万之间，其中大约80%是朝鲜女性。日本殖民当局以欺骗、绑架等手段将许多朝鲜女性送进慰安所，其中甚至包括12-14岁的女学生。直到1993年，日本还坚称朝鲜慰安妇是自愿卖淫的[18]。

3. 总结

兵站基地化政策对于朝鲜产生了多方面的复杂深远影响，战时的苦难经历成为朝鲜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沉痛创伤，并造成日韩间多次外交风波。

战时的人力掠夺破坏了朝鲜的经济基础，限制了战后朝鲜的复苏，也对朝鲜人民的身心造成了极大摧残。皇民化运动在战后留下了朝鲜民族劣等意识和殖民史观等后遗症，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对朝鲜民族的自主意识发展十分不利。

日本殖民当局在战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客观上给朝鲜半岛留下了一定的殖民遗产，推动了朝鲜的工业化进程。但这种发展是以朝鲜人民的血泪为代价的，且发展成果没有惠及朝鲜人民。朝鲜工人很少有机会担任高级职位，这导致战后的朝鲜发展工业时既缺乏充足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各工业部门间发展很不均衡且没有形成良性的产业经济循环，产业布局的地域差异也为战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埋下了祸根。

二十一世纪后韩国经常指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轻描淡写日本战时的侵略行为，慰安妇问题更是直接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2007年代表慰安妇幸存者的韩国团体要求日本重新道歉并赔偿，随后的争端逐渐导致了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冲突加剧，比如领土争端以及日本公司在殖民时期雇佣强迫劳工的问题。尽管日韩双方政府达成协议，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赔偿并重新道歉，韩国政府宣布此事已最终解决，但韩国民间强烈抗议。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允许韩国战时强迫劳工向日本索赔，并允许韩国政府扣押殖民时期雇佣强迫劳动者的日本公司资产。作为报复，日本收紧了高科技材料的对韩出口。日韩军舰和飞机之间发生摩擦，韩国还终止了日韩间的军事情报合作[19]。

这段兵站基地化的黑暗时期不仅加重了战时朝鲜人民的苦难，也成为横亘于战后日韩交往间的一大障碍，其殖民遗毒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于日本殖民罪行的批判与反思。

参考文献

- [1] 于乔麟. 从不平等条约看开港后朝鲜殖民化过程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2.
- [2] FAN X Y. A new probe into the strategic steps of Japan's annexation of Korea in modern times: focusing on the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world's powers [C]// Proceedings of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Desig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DS D 2021). Paris: Atlantis Press, 2022: 162-166.
- [3] KIM O T. 일제의 식민지정책 [J]. Korean Journal of Policy Studies, 1986(1): 107-125.
- [4] 曹中屏. 朝鲜近代史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277-278.
- [5] 张兆敏. 试析1910~1930年日本在朝鲜殖民政策的演变 [J]. 齐鲁学刊. 1995(6): 44-47.
- [6] [韩] 李基白. 韩国史新论 [M]. 厉帆,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361-362.
- [7] 曹中屏. 殖民地时代朝鲜半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意义 [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54-69.
- [8] 高丽大学校韩国史研究室. 新编韩国史 [M]. 孙科志,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237.
- [9] 小熊英二. 「日本人」の界限: 冲縄・愛努・台湾・朝鮮, 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 [M]. 黃耀進, 鄭天恩, 译. 台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318.
- [10] [韩] 姜万吉. 韩国现代史 [M]. 陈文寿, 金学贤,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19-21.
- [11] MYERS R H, PEATTIE M R,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332-333.
- [12] DUUS P, MYERS R H, PEATTIE M R,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59-60.
- [13] MILLER O. War, the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1931-60 [M]// Class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8: 157-176.
- [14] KING B L.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Kor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0-1945 [J]. Asian Studies, 1975(3): 1-21.
- [15] DUUS P. 剑桥日本史(第六卷): 20世纪 [M]. 王翔,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219-221.
- [16] 安成日. 略论日本侵略战争对殖民地朝鲜造成的损害 [J]. 韩国研究论丛, 2007(2): 250-270.
- [17] PALMER B. Imperial Japan's preparations to conscript Koreans as soldiers, 1942-1945 [J]. Korean Studies, 2008, 32(1): 63-78.
- [18] SOH C S.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 movement for redress [J]. Asian Survey, 1996, 36(12): 1226-1240.
- [19] PARK Y.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olonial rule and the battle over memory [M]. London: Routledge, 2024: 10-11.